

目 录

回忆周恩来同志一九二七年

在香港养病的经过.....范桂霞口述 杨 枫 潘 展 明 整理 (1)

记忆中的瞿秋白同志庄东晓 (13)

记彭德怀同志对晋东南

敌后游击队的一次视察陈 颀 (35)

回忆陈延年同志.....谭天度 (41)

陈延年烈士事略.....黎显衡 谢燕章 (52)

记在省港大罢工中的邓中夏同志.....吕 器 (59)

回忆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和

李克农同志.....曾昌明 (97)

疾风知劲草 真金不怕烧

——回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冯白驹同志

.....林克泽 (109)

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与游曦烈士.....陈德芸 (120)

徐成章烈士生平事略.....梁秉枢 (129)

忆陈铁军同志.....区梦觉 (134)

梁桂华烈士传略.....谢燕章 (137)

我国近代中日文化交流

先行者——黄遵宪.....黄延绩(149)

附：黄公度——戊戌维新运动的领袖.....(176)

军统特务组织的真象程一鸣(186)

勘误·补充·质疑.....(282)

回忆周恩来同志一九二七年 在香港养病的经过

范桂霞口述 杨 枫 整理
潘展明

我原是广州中山大学附师的学生，参加了CY。一九二七年“四·一五”那天晚上，因为叛徒冯锡出卖，我被抄家。由于我及早躲在邻居家中的厨房烟楼上，幸而脱险，但我父亲却遭到一顿毒打，因而不治而死。第二天，我逃往河南朱彩虹家，躲避了约一星期，再只身搭船到澳门，暂时住在荷兰园一位世伯家里。因为在澳门碰不到熟人，找不到组织，仅仅住了十多天就转往香港长洲族兄处，再设法找组织。不几天，在路上遇见了原来在广州市市立师范学校的一位姓李的团员，并由她介绍到了梨园书店〔注〕同党组织联系上。往后，又见到由于“四·一五”白色恐怖而逃到香港的很多同志，其中有冯君锐（宝铭）、朱英娥、谭任远、龙锦雯和沈宝同等。龙锦雯是我的好友，她和她的丈夫沈宝同住在石塘咀附近，他们的家就是广东省委秘书处所在地。我被组织派到那里当交通员，有时又做做接待工作。在这段时期曾经到过红磡、铜锣环、西营盘、湾仔、筲箕湾等联络站工作。记得，筲箕

注：梨园书店是当时地下党在香港的秘密联络点之一，该点由CY何志坚负责。

湾那个点是专门保管党的文件的，由冯菊波爱人谭平山的妹妹谭竹山同志负责。我和她一起工作了仅仅三天，由于特务经常出没，所以联络点也就经常转换。我在筲箕湾那个点转移后，又回到省委秘书处工作。我曾在凤凰台接待过瞿秋白、彭湃、董必武和李立三等同志。

一九二七年十月下旬，有一天我在省委秘书处，听到龙锦雯对沈宝同说：“不如叫范桂霞接待老周吧！”说完，她就转过身来问我：“你去接待老周好不好？”当时我还不知道老周是谁，就满口答应：“好，只要组织分配给我的工作，我就去做。”于是龙锦雯高高兴兴地对沈宝同说：“行啊！她去接待老周最适合了。”显然他们正在商量派谁去接待老周的问题。由于我答应了，事情就这样决定了。

在组织决定我去接待“老周”的第二天，赖谷良同志带我到了油麻地广东道的一间大房子。这是一间很大的古老大屋，客厅很大，里面陈设着一张床和一套酸枝台椅，还有一个挂钟等。屋里面还有一个房子，房里摆着一个五桶柜、一张双抽台，一张双人床和一张单人床，但台凳并不多，有几张藤椅。屋内还有一个工人房，当时雇了一个约六十岁的老妈子做厨工，她就住在里面。赖谷良和我进屋后，就吩咐我说：“你就在这里负责啰！”我问他：“究竟有什么东西可以做的呀？”他说：“你不要急，先等一会儿，很快就会有人来的，是叫你来服侍病人呀！”因为我父亲是个医生，一九二六年北伐战争前夕，我又在何香凝同志主持的中大护士训练班学习过救护工作，因此，组织上认为由我来服侍病人最恰当了。

就在这天下午四、五时左右，有一部黑色小汽车突然停在屋门口。我们就走出房去，只见车门打开后，杨石魂同志就把一个病人背了进屋来，扶上床休息。我仔细地端详着他，当我看着看着那病人，忽儿就认出来了：“啊！原来是周恩来同志！”我差点说出口

来。我为什么认出是周恩来同志呢？因为一九二六年我们学校曾组织学生去黄埔军校参观。我第一次见周恩来同志就是在黄埔军校，那天他恰好在会上演讲，自此以后，每逢在广州东较场开大会或在广东区委、省农民协会开会，都曾见过周恩来同志，所以我对他的相貌非常熟识。当时，见到病人来了，大家都忙起来，我招呼杨石魂同志把病人背到房里。我扶着周恩来同志，让杨石魂轻轻把他放下双人床躺下休息。周恩来同志当时完全是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打扮。身上穿的是灰黑色的唐装对胸衫，脚上穿的是一双浅口的、小头礼服绒面的黑色学士鞋。他病的很严重，瘦削的身体，昏昏迷迷，不醒人事，体温很高，正在发高烧。随后，医生也进房来了。医生给他看了病后，就对杨石魂同志说明了要注意护理的事项。不久，医生就走了。医生走后，杨石魂同志又把医生吩咐的事转告给我。他对我说：“这些药，现在给他吃一次，然后按上面写着的时间，定时给老周吃药。”他还把一根探热针和一个小本本交给我，吩咐我说：“要每隔一小时探一次热，并把它登记在这个小本本上。”他交待完之后，就外出忙别的事了。

我看到周恩来同志病得那么严重，就加倍小心照料。我整个晚上守在他身边，每隔一小时就给他探一次热，依时喂药给他吃。周恩来同志当时病得十分厉害，患的是恶性疟疾，唇焦口燥，高烧使他昏沉沉，连眼睛都不愿意睁开，只在我为他探热和喂药时，才艰难地撑开眼皮看看我，很快又合上了。每当我给他喂药水时，他就稍稍张开嘴。我只能一汤匙一汤匙地喂他吃。他不想吃东西，又没有跟我们说话，严重的疟疾折磨着他，使他忍受着无限的痛苦，但他一直没有呻吟一声，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无声的鼓励！

关于周恩来同志在“八一”南昌起义的情况，那是以后杨石魂等同志告诉我的。听说一九二七年十月上旬我起义军在汤坑撤退，

到最后在陆丰被打散，失败后，周恩来同志负责处理善后工作，其他领导同志设法离开部队。由于那时征战的艰险，他已经患上疟疾了，但他仍然不顾自己发着四十度的高烧，指挥和处理各项大量而复杂的工作，特别是安排二百多名党、政、军领导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的撤退工作。最后周恩来才和叶挺同志，在杨石魂同志（当时他任汕头市委书记）的陪同下，到了陆丰县一个姓黄的家。他在黄同志家里住了一段时间，就从陆丰坐渔船到香港来了。〔注〕

当时，只我一个人照料周恩来同志，因为杨石魂同志外边还有他的工作。每天晚上八、九点钟他才回来睡觉。他是单独一人睡在大厅里的。当天晚上杨石魂回来后，就问我：“你给他吃过药了吗？”我说：“刚才才吃过。”他又拿起那本小本本看了我登记的体温，看看周恩来同志后，他就去睡觉了。大概他忙了一整天，可能也够累的了。和我们住的那位老妈子，她只管厨房工作，很少理我们的事情，而且她又不懂护理工作。在房中还有一张我睡的单人床，我虽然很疲乏，但为了看守照顾周恩来同志，就整晚地坐着，不敢偷闲去睡一会。

周恩来同志来后的第二天，天刚刚亮杨石魂同志就出外工作了。我依然细心地给他喂药喝水和探热。到了第三天，周恩来同志的体温逐步下降了。他的精神也稍为好转了，能够时常睁开眼睛向我问话了。他起初用很微弱的声音问我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我给他回答后，他又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呀？”我看到他能说话了，就高兴地很快回答他：“叫范桂霞。桂花的桂，彩霞的霞。”他点了点

注：据查周恩来同志是在黄文秀同志（他家是陆丰县南塘区黄厝寮村，当时黄任南塘区委书记）陪同护送下与叶挺同志一起，在一个傍晚从金厢州塘村上船到香港的。——整理者（见全国政协《文史资料选辑》第五十六辑）

头说：“好，好听。”于是我就挪动了椅子坐在靠近他的床前，回答了他问我的问题。我把自己的经历都向他说了，并说明我是省委派来照料他的。他什么都问，我就什么都答，无拘无束地一一回答了他提的问题。真是一讲曹操，曹操就到。周恩来同志问我：“你认识杨石魂吗？”我正想回答的时候，杨石魂就带着医生进来了。这是我第一次同象兄长一般的周恩来同志讲话。

周恩来同志看到他们来了就愉快地和他们谈起话来。医生边看病边和他谈，并把病情告诉给他。医生临走时还安慰他说：“病情有好转，不必担心，继续吃这些药吧！”杨石魂同志又和医生一起走了。他有时一天出入几次，有时在“家”和我们一起吃饭，有时在外边吃，总是忙个不停。

周恩来同志没有吃东西好几天了。因为发烧，他只想喝水，不想吃饭，连面包之类的点心也不想吃，有时我就叫工人买点牛奶给他喝，但也吃得不多。他的身体实在瘦弱得很，我们都为他担心。过了大约有一个星期左右，我想，应该给周恩来同志补养补养，于是就和杨石魂同志商量。杨石魂同意了，于是我就叫工人去买只鸡回来，炖点鸡汁给他吃。但没想到周恩来同志见到是鸡汤，就有点不高兴地问：“为什么你们搞那么贵重的东西给我吃呀？”他不吃，他说：“现在党那么困难，还买那么贵重的东西给我吃！”我和杨石魂同志左劝右劝，不知劝了多少次，我说：“这是党特别派我做你的护士，你一定得听我的话吃呀！”他听后才勉强喝一点点。他边吃边说：“以后别这样了！”由于我们千方百计给他补充一点营养，周恩来同志的精神也就逐步好转了。当他能够起来时，就一定要和我们一起吃饭。凡是组织照顾他，买些炖品给他吃，他非要和我们平分吃不可，只有经我们再三劝说，他才肯喝多两口汤。周恩来同志很讲卫生爱清洁，吃饭时尤其是这

样，从未见过他的饭碗和桌旁有剩饭粒的。

周恩来同志天天挂念着党的工作。他刚刚好一点，就叫我和杨石魂同志扶他起来“学”走路。由于病渐渐好了，健康慢慢地恢复起来了。因此，周恩来同志和我们谈话就多起来了。我因为晚上要照料他，白天比较困，因此有时在白天睡一会儿。他凡是见我睡着了，从来不打扰我，让我好好休息。有一次，我睡醒之后，他就叫我坐在他床头旁边的椅子上，和我谈起话来了。他很和蔼可亲，我那时虽然还是个小娃娃，但也不觉得有什么拘束。他也很健谈，什么都谈，从国际形势革命前途到个人生活等等无所不谈。记得有一次他问我：“你认不认得邓颖超呀？”我说：“认得。”他又问：“你是怎么样认识她的？”我答：“在广州妇女解放协会开会时认识她。”他又问：“你有没有听到邓大姐现在在那里呀？”我马上说：“听到，她在上海嘛。”他微微笑了，又问：“是真的吗？”我答：“是真的，听到是真的呀！”我很奇怪，就反问他：“邓大姐不知道你病吗？”他若有所思的说：“可能不知道吧！”随后，他又问到沈宝同和龙锦雯等同志的情况。我就把他们俩结了婚，在省委秘书处工作的情况一一告诉了他。他很关心我。有一次，他问我：“你有爱人吗？”我羞羞答答地说：“对象是有了，但还未结婚。我们还未谈到结婚的事‘四·一五’就发生了，局势很不稳定，反动派杀了我们很多好同志。我们失去联系很久了，不知他……”周恩来同志见我有点忧虑的情绪，就安慰了我一番。我情绪安定下来后，就把我的未婚夫潘耀芳的情况告诉了他。我说，他是黄埔军校第四届毕业生，一九二五年入党，参加过打陈炯明的东征，后来被派到广宁去训练农民自卫军，“四·一五”后就失散了……。他一边耐心地听着一边安慰着我。他说：“你不要担心，这支人马北上了，是由清远、英德一路北上的。你不要太挂心，虽然现在暂

时不能和他联络上，但以后他一定会来找省委的。”听了周恩来同志这几句话后，好象天突然光亮了一样，顿时把我几个月来积压在心中的疑团驱散了。周恩来同志还象父兄一样教导我，要正确对待革命与恋爱的关系。最后，他意味深长地说：“只要你努力做好革命工作，如果那个男子是真爱你的话，是不怕暂时分离的，不论离开多久、多远，他始终会寻找你的！”他那亲切而富有感情的话，虽然是短短几句，却深深打动了我的心，使我十分感动。果然不出他所料，一九二八年元旦左右我的爱人由于在仁化响应广州起义，失败后，到香港找省委时我们见了面。

周恩来同志经常对我进行谆谆的教导。有一次他对我说：“接待工作是一件很重要很细致的革命工作。做接待工作的同志，什么都要学一些。”他讲得很细、很具体。他举例说：“比如就拿吃饭来说吧，你得要吃得干净、整洁一些。”跟着他问我：“你会不会抽烟？”我答道：“不会。我从来没有抽过烟的。”接着他又说：“你得要学抽烟，但你平时不要抽，如果要你去接待客人，人家给你递口烟请你抽，你得应酬一下抽一两口，表示礼貌。我在平时也是不抽烟的，但需要去应酬客人时，我就抽一两根。”讲完了抽烟，他又讲喝酒的问题。他问我：“你会不会喝酒？”我说：“不会，我从来没饮过酒。”他说：“这也得学习，以便应酬客人时能饮上一两口。”周恩来同志甚至问到我会不会打麻将牌。我那时刚刚从学校出来，差几个月才高中毕业，很单纯、幼稚，不懂什么社交。我就随便说了一句：“学这个干什么？”他就耐心地教导我说：“学这些不是为了花天酒地整天去玩，而是为了革命。革命工作需要你去应付敌人，你甚至可以和敌人面对面打麻将牌。对付敌人，太老实是不行的。”最后，他语重心长地勉励我说：“特别是在香港这个复杂的环境中，要多学一些本领，但不要染上资产阶级生活方

式和恶习。”

周恩来同志在多次谈话中，都教导我要勤俭节约。他说：“人要慳(节)俭，在家里要多穿旧的衣服。好的衣服留在上街外出时穿。不然人家在街上看到你穿得破破旧旧的，就觉得不太雅观了，特别你们这些小姑娘。”又说：“女仔要学好针线活，看到衣服快破了就赶快缝补一下，这样就耐穿。三年新，三年旧，三年补衫袖嘛！”周恩来同志这句“三年新，三年旧，三年补衫袖”的话，给我打下了深深的烙印，事情已经过了五十多年了，但我仍记得清清楚楚，并且一直是按照他的教导去做。我们党当时实在困难，没有什么经济来源。我们平日吃的东西都是由赖谷良同志买回来的。平日食用很节俭，青菜也很少吃，多数是咸鱼、大头(咸)菜之类做菜。我们大家都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。但是“如果需要你出大场面的话，你就要‘充’一下，不然人家会说你太小气、太寒酸，这反而对工作不利。”周恩来同志就是这样，处处以革命工作，把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来教导我的。

又有一次，周恩来同志跟我谈到语言问题。他问我：“我讲的话你完全能听懂吗？”我答道：“能听懂。”他又说：“你也得学讲北方话，将来有用处。我也学广东话，你可以帮助我学吧？你现在就可以讲广东话，我也能听懂的。”以后，我就多用广州话和他交谈，周恩来同志细心地听，有时跟着学。他学得很认真，大胆讲，有时他讲错了，走了音，我就禁不住的笑了起来。他还是重复的大声讲，引起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。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虚心地学，不怕讲错，他说：“学讲话、学语言就得厚着脸皮，不怕丢丑，大声讲高声读。”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我还向他学习了不少的北方话——普通话。

周恩来同志在“家”养病大约半个多月后，就去参加一连串的

会议。我每天陪着他去香港开会。我不知会议的具体内容和是那一级会议。但我见到约有二十人都是领导同志，可能是研究有关广州起义的问题。我们从“家”出发，要坐电船从九龙深水埗过海，然后步行到香港坚道的一间会议室。因为这段路途很多斜坡，虽然周恩来同志身体逐步恢复了，但仍然很瘦弱，每到上坡的时候，我总是扶着他，生怕他跌倒。第一天去赴会的时候他开始慢慢地走，走得气喘了，累了就停下来抹抹汗，再向前走，终于走到了。他高兴地说：“我们胜利了！”回到“家”后又说：“你看！今天多好啊，既锻炼了身体，又完成了任务。”那个会议室是在一座二层楼房大楼的楼下，里面有一个很宽敞的大厅，约四十平方米，陈设着酸枝台椅，很漂亮。我在那里先后见到过彭湃、瞿秋白、林伯渠、阮啸仙、李立三、黄平等领导同志。在休息室里，我又见到过彭湃夫人许玉庆和我熟悉的很多同志。其中有被当时男同志称为“三民主义”的龙锦雯、詹宝雯和欧夏文〔注〕等同志。会议开了有十多次，多数在上午开，有时在下午开，没有在晚上开的。每次开完会，各自回家吃饭，没有一次在会议室吃过饭。每次都是我一人陪周恩来同志去的，在第一次开会时，我和杨石魂同志曾商量去租车载周恩来同志去开会，但周恩来同志坚持一定要步行。所以每次都是步行去的。开会的地点没有变过，都是在香港坚道。可惜时隔太久记不住它的门牌号码了。

有一次，杨石魂同志在我陪周恩来同志去开会期间，约我去逛街。因为天天要开会，很忙碌，周恩来同志知道后，就批评了他：“你不要这样。她天天都要陪我去开会，很多工作要做，这么

〔注〕当时男同志追求她们。因为她们长得美，又年青，每个人的名字末尾都有个“雯”（文）字，所以有人取笑追求者为追求“三民主义”。

忙你还约她去逛街！我不准你这样的呀！桂霞是个好同志，你应该多多帮助她做好工作，去玩什么呀，现在还不是玩的时候嘛！”杨石魂同志很不好意思地接受了批评，不敢约我外出玩了。因为工作忙，我们始终没有去玩过，也没有上过馆子。

龙锦雯同志曾在会议将结束前的两天，在休息室问我：“你不想返广州呀？我们就快返广州了，你知道吗？”我问：“什么时候返广州？”她说：“具体日期不知道，总之是快的了。”我在当天晚上急不及待地问周恩来同志：“我们是不是快要返广州啦？”周恩来同志没有正面回答我，反而笑了笑说：“怎么？你想家了吧！”我急着又问：“究竟什么时候回去呀？”他坚定地说：“不会很久的了！”可见，会议是讨论过广州暴动的问题。

会议开完后，有一天周恩来同志告诉我，说他要返上海工作了。过了几天，他真的要走了。周恩来同志离开香港返上海工作的那一天，没有别的同志来送行。就是在养病期间也没有见过别的同志来过。那天，只有我和杨石魂同志送周恩来同志上船。是在九龙深水埗上船的，可惜忘记是在那个码头和那条船了。周恩来同志当时的行装非常简单，只有一个小皮箱。杨石魂同志帮他提行李，我空手陪着他，三个人一起步行到码头。周恩来同志在养病期间一般穿长衫，去开会时也是穿长衫，有时穿上一件马褂，从未见过他穿西装（李立三同志多数穿西装）。脚上穿的是一双黑色学士鞋。当时香港斯文的人多数穿长衫马褂，一般劳动人民是穿短衫的。当天，我和杨石魂送周恩来同志上船时，我们都没有走上船去，至于船上有没有其他同志，我一无所知。因为当时搞地下工作处在高度的保密情况下进行的，只能单线联系，不是自己工作范围就不能过问。周恩来同志临上船前还鼓励我们一番，勉励我们做好工作，提高警惕，注意敌情……。他一一和我

们握了手后，就大步大步走上船了。我们站在离船很近的岸边，含着泪花，挥手送别了象父兄一样教导过我的周恩来同志。这一个难忘的情景，直到今天我还记得清清楚楚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他是到上海参加中共中央扩大会议。十二月初，周恩来同志又回香港两三天，可能是研究广州起义的事。这是龙锦雯告诉我的。她说：“你想不想见老周呀？可惜他开完紧急会议就走了！”我们都因没有和他见面而惋惜。

周恩来同志在香港九龙养病大约是一个月左右。他是一九二七年十月下旬来的，到他离开九龙往上海那天已经是秋凉季节，大约是十一月下旬了。在养病这一个月又零几天的日子里，周恩来同志公开的身份是商人。他打扮成上海富商，改姓李，平时我们都叫他“李先生”。杨石魂同志公开的身份是李先生的弟弟，而我的公开身份就是李先生的“夫人”。我那时改姓黄。

送走周恩来同志的第二天，组织上就要我们撤走那个点了。这个工作还是由赖谷良同志负责办理退租手续。杨石魂同志叫我辞掉那位工人。我就对她说：“姨姐，李先生的病已好了，他要回上海了。我们的生意要转往上海，他可能两三个月才回来。我得回外（娘）家住一段……。”因为平时我们对她好，所以这位老妈妈很不舍得我们走，她说：“你们对我这样好，真不舍得你们走呀！”

解放后，我于一九五三年曾写信给周总理，把我的情况告诉他。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在八月廿一日接到我的信，八月廿二日就请我到他家吃饭。当我到中南海他家作客的时候，周总理那锐利的眼睛，一下子就把我认出来了。他一把抓着我的手，请我坐下问长问短。我就把我的经历简单地告诉给他听，当我说到已经有个小孙子的时候，他就爽朗地哈哈大笑起来说：“啊！我初次见你的时候，你还不过是个小女娃。那时我把你当小孩子一样看待，现在

已经做祖母了呀！”又问：“为什么不带你的小孙儿给我看看呀？”他若有所思地说：“真想不到，我们又见面了！”那天，总理请我吃饭，有一个鸡汤、一碟炒肉片和北京烤鸭，还有馒头。周总理住在中南海，房里陈设得俭朴大方，我们坐着的都是些旧椅，但很清洁。

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虽然离开我们三、四年了，但总理几十年前对我的谆谆教导，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。

范桂霞口述（一九七九.一二.二六）

杨 枫 录音整理（一九八〇.四.二五）
潘展明

记忆中的瞿秋白同志

庄 东 晓

瞿秋白同志的思想，通过他在《新青年》、《向导》等刊物上发表的论述，早已成了我前进的精神力量。但是直接在他领导下工作，还是在大革命失败之后。迄今虽已五十多年了，可是他的音容笑貌，仍活生生地涌现在眼前。

一、汉口初见

一九二七年，蒋介石于“四·一二”在上海大肆屠杀，汪精卫于“七·一五”在汉口又发动了政变，杀气腾腾，白色恐怖笼罩全国，我们党被迫转入地下。

在乌云满天的一个初秋早上，国际联络处交给我一份急密文件，必须及时送到秋白同志的手上，我感到又兴奋又紧张。兴奋的是党对自己的信任，紧张的是自己回国不久，缺乏做地下工作的经验，万一有负党的委托，怎么办呢？

终于紧张化作力量，我立即束装打扮，扮成个阔小姐，把文件藏在身上最安全的地方——奶罩里边，坐上人力车，迅速向秋白同志的住所——辅义里驰去。为了便于观察四周围的动静，离辅

义里还很远，我就下了车，装作散步，兜了几个圈子，确定没人盯梢了，才按址去叫门，照预约的叫门法按了门铃，门洞里露出个看不清的面孔，用约定的暗语通了话。门开了，见华姐坐在一张矮凳子上，整理着散乱的纸张和衣物，好象是准备迁居，也许是为秋白整理行装。由于敌人的追捕，秋白同志必须离开汉口。中央这一决定，我是知道的。

在房子的另一端，靠近窗户的一边，一个人正伏在桌子上，埋头写着什么。只见他面色苍白，额角上似乎还挂着汗珠。当我把文件取出，说要亲自交给秋白同志时，这位聚精会神伏首写着什么的人，只是调转头看了看我手里拿着的文件，拆开来看，连我是谁，叫什么名字，也没问一声，他的全副精力仍贯注在他写的东西上，还是华姐指着我对他说：“你们没见过吧？她就是我同你说过的八妹（为了应付环境，我们以姐妹相称），秋白你听到吗？”我正想走近两步去打招呼，只见他已漫不经心地转过身去，好象是点了点头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久已闻名的秋白同志。虽不曾说过一句话，但是在我脑子里的印象是深刻的。

华姐边让我坐下，边带着关心和无可奈何的神情对我说：“他昨晚还发着高烧，整夜没睡，一早又爬起身，忙起来了，药也不顾得吃，不听劝，没办法。”华姐边说边打量我，她笑着说：“你扮的还象，只是帽子配不上。”随手从衣物里检出一顶帽子，替我戴上，一股老大姐关照小妹妹的热流，流遍我的全身。

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，难道真是特殊材料制造的吗？这在秋白同志的身上，已完全作了肯定的回答。他病的那么重了，处在那样恶劣的情况下，还是坚持为党工作。当革命遭受严重挫折，在革命的急流漩涡里，有的彷徨失措，悲观失望，有的脱离队伍，甚至折戟沉沙，背叛革命。而秋白同志在腥风血雨中挺身而出，力

挽狂澜，特别使人难忘的是他百折不挠的为维护党的正确路线，坚决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果决言行。他公开声言：“我要做一个布尔塞维克，我将服从真正列宁主义的纪律，我可不怕皇帝制度斩首，我敢说中国共产党内有机会主义。”当时的陈独秀，恰似个专制家长，一言堂，独行独断，人们以“老头子”相称，同这么个声威赫赫的机会主义的头头展开斗争，谈何容易。

秋白同志不顾个人利害，一九二六年当广州市委书记陈延年同志向领导提出不同意见，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时，在争论中秋白同志首先同意延年同志的意见。当陈独秀反对上海工人罢工以配合北伐，强令收回罢工令，并将武器交给国民党时，秋白同志就指出：“领导上存在路线错误，无原则的保持与资产阶级的联盟，而无领导群众革命的决心。”一九二七年二月间就写了《中国革命中之争论的问题》小册子，严正指出无产阶级应当去争取领导权，中国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。

对农民运动，秋白同志更非常重视。他一九二六年八月到一九二七年三月间到广州及汉口，亲眼看到农民运动的高涨，认为“五卅”运动效果之不够理想，是由于缺乏农民参加，他认为：“中国革命中的中枢是农民革命”，一九二七年四月当陈独秀不许发表毛泽东同志的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时，秋白同志为之作序，不但刊印，还力争出单行本。

在党的五次代表大会上，将自己写的《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》印发给到会每个代表，展开争论。

在八月七日召开的党的紧急会议上，秋白同志同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，改选了中央政治局，撤销了陈独秀家长式的机会主义领导，发出《告全党同志书》，将陈独秀的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实质，尽情予以揭露批判，率领着全